

论道

多维度打造咖啡文化，全方位演绎上海气质

■ 包亚明

上海咖啡文化与上海城市气质具有共生共荣、相互成就的紧密联系，上海咖啡馆与上海的市民品质生活、精神气韵、城市温情乃至海派文化，都具有内在的“互文”关系。深度挖掘上海咖啡文化的“前世与今生”，打造多维度的咖啡文化，不仅可以提升消费体验、推动业态融合、提高城市生活品质、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而且可以通过咖啡的媒介作用，全方位地演绎上海城市气质、品格特征与风情气韵。

历史的“厚度”

海派文化与上海记忆的重要载体

早在咖啡进入上海25年前的1819年，作为coffee译名的“咖啡”，已经出现在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之《五年韵府》第一卷，这一目前通用的译名，其实是最早出现的。1866年上海的美华书馆刊印了《造洋饭书》，这是美国南浸信传道会教士高第丕夫人编写的，全书共二十五章，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西餐烹饪书籍；高第丕夫人在书中将咖啡译为“咖啡”，认为咖啡可以减肥作用，并详细叙述了制作咖啡的方法。

最晚至1876年，咖啡已进入上海人的日常饮食生活中，当时上海的西餐馆都以咖啡作为招徕顾客的方式。最早的咖啡广告出现在1876年的《申报》：“今在二洋泾桥新开咖啡番菜馆，各色面食，早晚常便，若有贵客光顾者，请至小店可也。”1887年刊印的《中江百咏》收录了一段竹枝词“几家番馆掩朱扉，喂鸟不排不厌肥。一客一番凭大嚼，饱来随意饮高啡。”其中的“番(菜)馆”指的是西餐馆，“咖啡”的译名则演变成了“架啡”“高啡”，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上海市民吃西餐、喝咖啡的生活场景。

1920年代的咖啡馆在上海衍生出了一股文化热潮，1928年8月6日《申报》出现了新专栏“咖啡座”，张资平开设了上海咖啡馆，田汉在其经营的南国书店旁开设了Café la Midi，并创作了《咖啡店之一夜》……当时的文化名人张若谷等都曾写下以咖啡店为主题的作品。

开放的“高度”

坚持不懈与世界对话的开放精神

最初的上海咖啡馆扮演着“上海观察世界之窗口”以及“世界进入上海之港口”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咖啡馆在店名别称、建筑风格、内部设施、品饮方式、乃至店员女侍等方面，都呈现出与西方风格的茶馆截然不同的“异国情调”，成为上海了解西方生活方式的“窗口”；另一方面，咖啡馆大都是旅居上海的外侨创设和经营

【核心观点】

◆ 最初的上海咖啡馆扮演着“上海观察世界之窗口”以及“世界进入上海之港口”的双重角色。后来，咖啡馆日渐成为一部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间。老上海咖啡馆的发展历程折射了近代上海地域文化特征和市民人情百态。

◆ 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上海咖啡馆开始与现代生活、时尚潮流对话碰撞，一起突破产业边界，共同缔造创意空间和复合消费场景。咖啡馆各凭自己特色，施展创造力，成为了市民创意创造力的孵化地。

◆ 上海咖啡馆既是城市品质生活和海派文化的风向标，又是城市温情与善意的坚定实践者，其所散发的“关怀的温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体现在对犹太难民的开放与包容中，今日上海咖啡馆依旧延续着这种温暖的传统。

的，最初功能也主要是为身处异乡的异客们提供公共空间，成为他们进入上海栖息、休闲和聚会的“港口”。后来，“窗口”与“港口”的边界日渐模糊，消费群体也逐步扩展，咖啡馆日渐成为一部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可以说，老上海的咖啡馆的发展历程折射了近代上海地域文化特征和市民人情百态。

1934年，文学家翻译家曹之在《上海的将来》中写道：“人常讥上海是四不像，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的怪物，这正是将来文明的特征。将来文明要混合一切而成，在其混合的过程中，当然表现无奇不有的离奇现象。但一经陶炼，至成熟纯净之候，人们要惊叹其无比彩耀了。”所谓“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一方面指上海文化滥觞于历史悠扬的江南文化；另一方面指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与融合中，上海文化对复杂多元的西方文化的理解、吸收与转化。这不仅是上海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开放的高度”，也是上海咖啡文化的内核所在——坚持不懈与世界对话的开放精神，从未停止观察世界、接触世界以及融入世界。

包容的“气度”

精神品格的呈现与城市气质的孕育

上海“包容的气度”体现在方方面面，既有对新鲜事物的包容、也有对人的包容，甚至还有对不确定性的包容。包容已经内化为上海的城市气质与精神品格，不同民族、国籍的人士在上海很容易感受异质文化的吸引力和交融性，这在上海咖啡文化中同样得到了生动体现。

1938年法国埃维昂举行了犹太难民问题国际会议，32个国家代表纷纷表达了对犹太难民的同情，但

却没有什么具体的救助举措。当世界各国都将犹太难民拒之门外时，上海向面临绝境的数万犹太难民张开了怀抱，这一数字比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所接受的犹太难民的总数还多。1939年，来沪避难的犹太难民鲁道夫·莫斯伯格夫妇在长阳路临潼路口开办了白马咖啡馆，这家气氛温馨、服务周到的咖啡馆兼具了餐厅、酒吧和夜间俱乐部的功能，成为当时犹太难民重要的日常聚集场所。2015年白马咖啡馆复建完成，犹太难民后裔萨拉·伊麦斯捐赠了“风雨同舟”纪念雕塑，雕塑伫立于白马咖啡馆前，呈现了一位母亲为怀抱玩具熊的小女孩撑起雨伞遮挡风雨的情景——这座雕塑以及充盈历史记忆的白马咖啡馆正是上海包容与仁爱的见证。

从大街小巷到地铁楼宇，从工作生活到人际交往，咖啡的身影无所不在，人们在咖啡馆里摆脱了工作环境的约束，远离了日常生活的牵累，自由支配闲暇时间，充分享受公共与私有、工作与休闲相结合的第三空间。包容的海派文化同时也缔造了城市优质的营商环境。可以说，上海咖啡馆发轫于上海“包容的气度”，同时也为这座城市孕育了包容的氛围。

创造的“力度”

缔造创意空间和复合消费场景

上海作为伟大梦想的启航地，始终走在时代发展前沿，创新创造力仿若天赋异禀，深深地印刻在上海以及上海文化的骨子里。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上海咖啡馆开始与现代生活、时尚潮流对话碰撞，一起突破产业边界，共同缔造创意空

间和复合消费场景，咖啡馆与书店、美术馆、音乐厅等静谧空间融合，形成了立体、多元的休憩场所。葛屋、西西弗、言几又、钟书阁、建投书局等书店与咖啡业态、文创零售进行了完美地融合，M50创意园的BROWNIE咖啡馆通过与艺术商品结合打造了独特“第三空间”，馆内收集了来自全球的独家摄影作品以及小众的家居单品，供不定期展览及发售。

上海咖啡文化在消费场景打造方面也呈现出强大的创造力，例如开设在上海香港广场的The Tiffany Blue Box Café是奢侈品零售店和咖啡馆两种业态创意交融的代表；主打服饰鞋履等“潮品”与DOE咖啡馆合作，延请日本设计师青山周平在新天地分店打造了咖啡馆里的赛扬式看台座、咖啡台、服饰售卖区等；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则把剧目片段演出、剧场衍生品、线下购票等服务带到咖啡馆，做强“咖啡+文化”的品牌；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WLA)上海中心和科学会堂则着力营造“咖啡+科学”的独特氛围。上海咖啡馆的迭代更新周期很快，咖啡馆各凭自己特色、施展自己创造力，吸引不同维度的目标客群，咖啡因而成为了市民创意创造力的孵化地。

文化的“深度”

与生俱来的气韵与江南文化的滋养

上海咖啡文化拥有与生俱来的精致气韵，咖啡爱好者似乎深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最专业的咖啡机品牌La Marzocco以及最专业的磨豆机Mahlkonig EK43，几乎成为在上海开设精品咖啡馆的“标配”。在做精做透咖啡产业方面，上海咖啡馆充分吸收了国际先进的咖啡馆精英理念和运作模式，让上

海市民可以方便感受细腻、周全、精致、雅致的咖啡文化气韵。

精致的上海咖啡文化不仅得益于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还得益于传统江南文化的滋养。正如陈思和教授在《(天香)与上海书写》中指出：“即使在今天的上海历史文化的教科书里，上海的现代性就是从‘开埠’开始的，上海的历史也就是这样一百六七十年的。作家通过书写上海的‘前史’，形象地告诉读者：上海的前现代史可以追溯到五六百年以前的明代中叶。”江南文化和上海文化“不约而同”地展现出一种精致的深度，而江南的咖啡馆恰是这种精致的缩影：苏州、杭州等大城市独立咖啡馆星罗棋布，例如黑叶咖啡店是苏州第一家在烘焙和冲煮中真正意义上沿用日式咖啡内核的一家小店。即使在丽水这样相对偏僻一点的江南地区，也与咖啡深结不解之缘。丽水拥有40万海外华侨，清末民初华侨们带回的第一包咖啡使咖啡文化植根于丽水的城市基因；而今依托华侨进口商品博览会把产品展示、专业论坛、文化交流等结合起来。可以说，咖啡已经成为丽水的文化地标，据测算，仅在丽水东南部的青田县，每天的咖啡消耗量就能达到1万杯。

城市的“温度”

平等融合的关怀与善意温情的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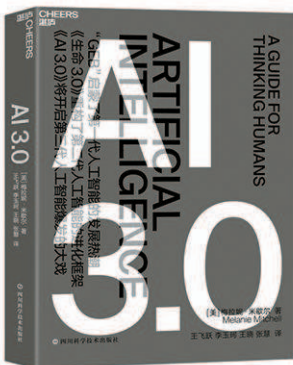
上海咖啡馆既是城市品质生活和海派文化的风向标，又是城市温情与善意的坚定实践者，其所散发的“关怀的温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体现在对犹太难民的开放与包容中，今日上海咖啡馆依旧延续着这种温暖的传统。1月末，上海星巴克手语门店在黄浦绿地缤纷城悄然开业，手语门店中的听障店员占比约50%。这杯咖啡带给他们的不仅是工作机会，更多的是提供了与健全人士正常沟通的空间，他们可以凭借一份体面的职业自食其力并获得社会的尊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海咖啡馆为残疾人士融入社会提供发展空间，例如“网红”熊爪咖啡，其店铺门面只有一个小小的洞口，毛茸茸的熊掌会时不时的互动，如摸头、握手、击掌、比耶等。这家咖啡店的店长是一名听障咖啡师，店内还有两名听障店员，戴着熊爪逃出咖啡的店员曾经遭遇面部烧伤。

一个城市的温度取决于城市的空间主体，即“人”的行为模式是否得到充分的尊重，这些带着公益属性的上海咖啡馆正坚定地传达着上海城市的温情与善意、海派文化的平等与融合。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荐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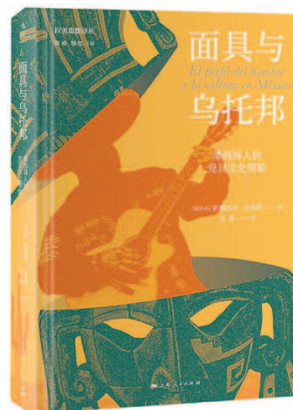
《AI 3.0：思考人类的指南》(梅拉妮·米歇尔 著，王飞跃/李玉珂/王尧/张慧 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2月)

本书源自米歇尔多年来对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真实状态的记录，她在书中通过5个部分揭示了“现在的人工智能可以做什么，以及在未来几十年我们能从它们身上期待什么”。在描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之后，作者通过对视觉识别、游戏与推理、自然语言处理、常识判断这4大人工智能领域的热门应用的发展现状和局限性的探究，厘清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关系，书中关于人脸识别、无人驾驶、机器翻译等方面的案例分析都充满了巨大的启示。



《病毒博物馆》(〔法〕弗雷德里克·凯克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

本书聚焦于非典和禽流感疫情之后，东亚地区针对跨物种传染病所做的防范研究。法国哲学史学家、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凯克基于在香港大学巴斯德研究中心的长期田野调查，观察并追访了微生物学家、兽医和鸟类学家们的工作，从中总结出和公共卫生措施并行的防疫策略，提醒人们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病原体传播与人类社会的关联、不同学科关于动物传染病的理解和意见有何不同等等。他尤其讨论了专家们如何转换视角，从鸟类甚至病毒的眼光来解读世界、帮助防疫。



《面具与乌托邦：墨西哥人民及其文化剪影》(〔墨〕萨穆埃尔·拉莫斯，艾青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

在世界文化与本土文明之间，在现代技术和精神文明之间，如何“认识你自己”？这不仅是墨西哥的问题，也是每个第三世界国家人民都面临与反思的问题。萨穆埃尔·拉莫斯深入解剖塑造民族心理的历史力量，指出殖民制度造成了墨西哥人灵魂深处的自卑感，让他们不敢正视过去，企图将历史一笔勾销，从零开始。然而，真正的自救之路应该是直面自我，辩证地看待历史遗产和民族性的优劣。本书堪称拉丁美洲哲学走向成熟、引起世界注意的突破作品，是用历史主义和现代心理学的理性眼光分析具体民族文化的尝试。

行业研究

互联网医疗企业：到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 罗俊 徐婉迪 陈烨欣

互联网医疗企业需要权衡好盈利和社会责任，严格遵守医疗行业的规范要求，全面提高合规意识，完善并落实内控制度。这不仅能保障互联网医疗的安全性，也是互联网医疗企业风险防范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近年来，互联网医疗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使得互联网医疗的优势被进一步发掘，国家卫健委连发两文推动互联网医疗的加速应用，政策利好促进互联网医疗的规模和影响快速扩大。但是互联网医疗企业的商业模式仍处发展初级阶段，亟待深入探索与试验。

作为发展前提，互联网医疗企业首先要恪守医疗行业规范，履行社会责任，同时注意风险防范。只有明确

医疗要服务于大众，理应到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才是互联网医疗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现阶段的互联网医疗企业主要围绕药品、内容和疾病提供医疗服务。围绕药品提供医疗服务的互联网医疗企业，通过将药品咨询、找药、购药、处方开具、用药管理等医药服务线上化，形成类似“在线外卖”的平台经济模式，其发展已趋成熟。围绕内容提供医疗服务的互联网医疗企业，主要通过“互联网诊疗平台”整合医生资源，提供文字、语音、视频、直播等问诊服务，如春雨医生和丁香园等。未来，该模式可以进一步演化成两类更复杂的共享服务，一是“移动医疗手术平台”，整合患者、医生及医院信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患者匹配合适的医生、医院以接受手术治疗；另一类是有自己的医疗资源，诸如诊室、体检中心、VIP诊疗中心、日间手术室，为区域内三甲名医乃至全国

资深专家提供场所的“多点执业共享平台”。围绕疾病提供医疗服务的互联网医疗企业，将挂号、复诊预约、名医预约等医疗服务线上化，有助于解决患者“看病难”问题。

但是，供需矛盾突出是我国医疗长期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受制于区域间经济水平差距，医疗资源在地区间分布不平衡不充分。分级诊疗推进不彻底，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三级医院数量仅占医院总数的19%，却承载了全国49.8%的医疗需求，优质医疗资源紧张。

在这一背景下，互联网医疗企业的发展更应该为缓解供给侧不平衡提供支持。但是，企业必然以盈利为目的，如何权衡盈利和社会责任，以及进行风险防范尤其重要。

群众的基本需求，势必造成企业与医院合作关系的破裂，最终反噬企业自身。

因此，互联网医疗企业需要权衡好盈利和社会责任，严格遵守医疗行业的规范要求，全面提高合规意识，完善并落实内控制度，在履行其社会责任的前提下，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不仅能保障互联网医疗的安全性，也是互联网医疗企业风险防范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互联网医疗企业在其运营过程中，除一般企业常见的市场风险外，还面临医疗事故风险、信用违约风险、信息安全风险、政策风险等。

其一，信用违约风险的主体有所增加。首先，互联网医疗平台也可能成为违约主体；其次，患者具有分散程度高、数量大的特点，且医生、医院等具有多主体性，使得违约主体数量显著增加。其二，信息安全风险更为突出。在医疗资源组织和整合的过程中，大量医患数

据被收集并存储于互联网平台，带来了信息安全风险。

同时，互联网医疗企业与医生、医院之间必须在建立合作关系前明确如何分担风险、分享利润，尤其是在协议中对医疗事故风险、信息安全风险及隐私保护、政策风险等潜在风险及责任承担进行合理且明确的划分。在此基础上，政府需要加强对互联网医疗企业及医生、医院的监管力度，并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规范各方行为，控制风险的发生。

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互联网医疗企业可以在长三角地区进行试点，大胆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深化医疗资源在区域内的共享程度；可以另辟赛道、面向基层，通过互联网技术优化配置医疗资源，缓解医疗资源地区间不平衡带来的供需矛盾。

(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医学院)